

《太平广记》的文献学研究综述

曾礼军

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,《太平广记》的文献学研究,主要涉及《太平广记》的版本、引书、编纂情况、文献价值和文本传播等几方面。本文试对此作一巡视。

一、《太平广记》的版本研究

最早对《太平广记》版本进行研究的是邓嗣禹和岑仲勉两位先生。他们主要是对《太平广记》的谈恺刻本和许自昌刊本进行较为详细的比较,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。邓嗣禹推崇许本“于校讎之功,似较谈恺专而且多”^①;岑仲勉则认为谈刻本增补了篇目不加出处的做法保存了《太平广记》的原貌,而许刊本于增补篇目后加出处是“佛头著粪”,破坏了书的原貌^②。邓氏看重的是许刊本,而岑氏更重谈刻本。

建国后,汪绍楹在对《太平广记》根据卷二六一至卷二六五、卷二六九和卷二七〇等几卷缺失情况不同,把谈刻三种版本分为“初印本”、“后印本”、“最后印本”^③,为《太平广记》版本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。1988年,程毅中对这三种版本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文献考证,相对应提出“甲本”、“乙本”、“丙本”的概念,并且对汪氏所确定的刊印顺序提出了一些质疑^④。

1969年台北艺文印书馆主人严一萍再利用汪绍楹点校本、孙潜校宋本以及《类说》、《说郭》等书,进行比对校讎,历时约两年撰成《太平广记校勘记》^⑤。《校勘记》主要是对不同版本的一些异文、佚文等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张国风对《太平广记》的版本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

①邓嗣禹:《〈太平广记〉篇目及引书引得·序》,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印,1934年。

②岑仲勉:《跋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末谈刻及道光三让本〈太平广记〉》,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》第12册,1948年。

③汪绍楹:《太平广记·点校说明》,李昉等编:《太平广记》,中华书局,1961年。

④程毅中:《〈太平广记〉的几种版本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8年第3期。

⑤严一萍:《太平广记校勘记》,台北艺文印书馆,1971年。

就。张国风首先对《太平广记》现存版本的演变情况进行了研究,认为清人孙潜校本、清人陈鱣校本和明人沈与文野竹斋抄本都是以宋本为底本,且前两者是“南宋高宗时的刻本和抄本”,因为都“避讳至‘构’字”,其中孙潜校本比陈鱣校本更近北宋,而孙潜校本与野竹斋抄本多有吻合,三者比较而言,孙潜校本“最为珍贵”,因为它“留下了最丰富的有关宋本的线索”;明嘉靖、隆庆年间谈恺刻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,此后明代隆庆、万历年间的活字本、明末许自昌刻本、清乾隆二十年黄晟槐荫堂刻本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汪绍楹校点本都是起源于谈刻本,“在它的基础上有所增补或改变”。其次,张国风对谈刻的几种版本刊印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认为汪氏所谓的“后印本”实为谈刻本的“第一次印本”,所谓“初印本”乃是真正的“后印本”,而“最后印本”仍为最后定本,解决了程毅中先生的质疑;同时,张国风还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发现一种新的谈本,称之为“新谈本”,其产生在前两种谈本之后,最后定本之前^①。第三,张国风认为《太平广记》选本——韩国的《太平广记详节》也是以宋本为底本。第四,张国风在参考台湾学者严一萍《太平广记校勘记》和卢锦堂《太平广记引书考》的基础上对各种版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,研究了《太平广记》诸版本总目录篇名的异名情况、一些版本中的佚文和异文情况,以及各版本对卷一四一遗失所带来的卷次分合与篇目调整情况、卷一五〇有目无文带来的卷次分合和篇目调整情况等。

由张秉楠执笔撰写的吉林省“八五”社科规划项目《太平广记》校注课题组的初步成果《〈太平广记〉校勘札记》,在版本研究上,提出了两点异于前面的研究成果。其一是充分肯定了陈鱣校本在保存宋本原貌的版本价值,而认为孙潜校本所用底本当为谈刻丙本,其用作对校的钞本为宋钞本的说法“则难以肯定”。其二是对谈刻三本刊印的先后顺序作了异于此前的研究,认为谈刻三本虽有先后,但先出者并不一定是初印本,考明活字本与谈刻乙本多有相同,因此推测明活字本应是先于谈刻本刊印出来,“与其以谈刻乙本为初印本,不如以活字版为初印本更为合理”;并且认为谈刻丙本也并非最后印本,其和甲本的刊印“在时间上相距不久,且各自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下进行的”^②。

此外,台湾学者王国良先生、日本学者富永一登也分别对《太平广记》的版本情况作过一些研究^③。盛莉《历代〈太平广记〉已知版本一览表》则对《太平广记》已知版本的整体风貌作了概览^④。

①张国风:《〈太平广记〉版本考述》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18、16、83页。

②《文史》第五十二辑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138、136、137页。

③王国良:《〈太平广记〉概述》,《太平广记》(全五册),文史哲出版社,1981年;富永一登:《关于〈太平广记〉诸本》,《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》第59期,1999年。

④盛莉:《〈太平广记〉仙类小说类目及其编纂研究》附录二,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,2006年。

二、《太平广记》的引书研究

《太平广记》的引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明谈恺刻本《太平广记》前的引用书目计有三百四十三种,减去各重复一次的《妖乱志》与《河洛记》,实为三百四十一種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称其引书为三百四十五种,日本学者山田利明也认定《太平广记》引书只有三百四十五种^①。

邓嗣禹在《〈太平广记〉引书引得》中以谈本引用书目与《太平广记》正文实际引书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:“有书目所有而书中无者十五种,有书目所无而书中实引之者,约百四十七种;合而计之,现存《太平广记》引用之书,实有四百七十五种。其中存者约百分之四十七,不存而史志未著录者亦百种有奇。”^②郭伯恭《宋四大书考》亦持邓氏观点^③。后来,台湾叶庆炳又对邓嗣禹《引书引得》的遗漏和失误作了一些补充与修正^④。卢锦堂受邓氏启发并吸收其研究成果,对《太平广记》引书分二大类四小项进行分析,得出最后结论:“引书之见于历代书志而引用书目复有其名者,凡二百五十五种;引书之见于历代书志而引用书目无其名者,凡四十八种;引书之未见于历代书志而引用书目有其名者,凡五十八种;引书之未见于历代书志而引用书目亦无其名者,凡五十八种。”同时卢氏又指出:“《太平广记》所引乙书,有疑即甲书者”,“若上述所疑属实,则《太平广记》引书种数又少于四百一十九种矣。”^⑤

李裕民称《太平广记》“实际引书为四百七十九种”,其统计方法只是简单地将《太平广记引用书目》中重复的二书和引用书目中有而书中未引的十种书剔除,再加上书中实引而《引用书目》中所没有的一百三十八种^⑥。

张华娟以《太平广记引书引得》为主体,辅以《太平广记引用书目》、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《太平广记索引》,进行了统计分析,得出统计结果:“总共是五百一十二种书,其中包括前面原书目部分列出的十六篇单篇文章,还有后面增补书目中的二十三篇单篇传记或传奇。去掉这三十九篇单篇,则余四百七十三种引用书。”^⑦其中现存引书二百零六种,佚而不存者引书二百六十七种,分别占到全部引书四百七十三种的43%和57%。马念祖确认《太平广记》引书有五百二十六种之多。^⑧

①山田利明:《〈太平广记〉神仙类卷第配列之一考察》,《东方宗教》第43期,1972年。

②邓嗣禹:《〈太平广记〉篇目及引书引得·序》,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印,1934年。

③郭伯恭:《宋四大书考》,商务印书馆,1940年,第63页。

④叶庆炳:《〈太平广记〉引书引得补正》,台湾辅仁大学《人文学报》第2期,1972年。

⑤卢锦堂:《〈太平广记〉引书考》,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,1981年。

⑥李裕民:《四库提要订误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90年。

⑦张华娟:《〈太平广记〉研究》,山东大学博士论文,2003年,第114页。

⑧马念祖:《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书目汇编》,中华书局,1959年。

《〈太平广记〉校勘札记》一文则列举了《太平广记》引书中七种讹误情况——“书无定名”、“同名书不分”、“相近书名混讹”、“以引书文末原注出处误作引书名”、“书名因字形、声、义相近致误”、“以晚出书误充《广记》引书”以及其他情况等；并且通过“对中华书局汪校本《太平广记》各条引文所注出处逐一审核，去掉误名、异名，加上应补充的十一种引书以及因同名书不分而需补充的四种同名书，则全部引书当为四百零六种。其中尚存之书为一百四十六种，佚书二百六十种，佚书约占实际引书数 64%。佚书中，有二十四种难以考索，另有十二种州、县《图经》亦多不可考。”^①

张国风认为鉴于《太平广记》引书的复杂性，要对其引书作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是根本无法实现的^②。程毅中也持相同观点，认为《太平广记》引书“问题很复杂，需要作许多校勘、考证的工作”，因此“《太平广记》的引书，根本不可能统计出一个确切数字来，只能说大致有四百多种”^③。

除了对《太平广记》引书整体情况进行研究外，叶庆炳还对《太平广记》经部引书和史部引书作过精密、详细的考证^④。对于《太平广记引用书目》，邓嗣禹《〈太平广记〉引书引得序》、郭伯恭《宋四大书考》都认为是别人所加；张国风则确定“十之八九为谈恺所加”^⑤。此外，谈本《太平广记》中未注明出处的篇目、《永乐大典》中标明出自《太平广记》的条目，张国风《〈太平广记〉版本考述》都一一作了查考。

三、《太平广记》的编纂研究

《太平广记》编纂研究主要包括编纂的时间、成因、人员和体例等方面。

《太平广记》的成书时间是在太平兴国三年还是八年是一个争论的话题。前者是据李昉《太平广记表》，后者是据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五四。《〈太平广记〉校勘札记》一文通过考察《太平广记表》中“撰人官衔与《宋史》本传所载兴国三年任职相合，而与八年任职不合”，确定《太平广记》成书于太平兴国三年^⑥。张国风也认为成书时间当为太平兴国三年八月，且其起始编纂时间为太平兴国二年三月。

《太平广记》编纂的原因，不少人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，认为其编纂的目的是为了安抚前朝遗老，使之“老于文字之间”而不思叛逆之心。如邓嗣禹、郭伯恭、胡道静等都持此观点^⑦。赵维国认为人们过多地关注了其成书的政治外

①《文史》第五十二辑，第 140-142、142 页。

②张国风：《〈太平广记〉版本考述》，第 120 页。

③程毅中：《太平广记》，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20 页。

④叶庆炳：《〈太平广记〉引用经史两部书籍考释》，《淡江学报》第 10 期，1972 年。

⑤张国风：《〈太平广记〉版本考述》，第 116 页。

⑥《文史》第五十二辑，第 133 页。

⑦详见胡道静：《中国古代的类书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 年新 1 版，第 20-23 页。

在因素,而相对忽视了其文化的内在因素,因而从文献整理、宋太宗的文化修养、唐代小说的发展等三方面论述了《太平广记》成书的文化因素^①。张华娟则从“宋初偃武修文政策、诸降国图书汇拢及笼人才和人主嗜好等”社会背景和“宋代文化特点、宋文士喜好及稗史增多、文史分离”的文化背景出发探讨了《太平广记》成书背景^②。

关于《太平广记》编纂成员的组成,《太平广记表》只有十三人,没有李克勤、徐用宾、阮思道和舒雅四人的名字;而《玉海》指出李克勤、徐用宾、阮思道都曾参加过编纂,后因事退出,改用王克贞、董淳、赵邻幾三人,并且多出舒雅一人,共十四人。张国风认为《玉海》的记载是正确的,王克贞、董淳、赵邻幾三人是在李克勤、徐用宾、阮思道和舒雅四人退出后补入的^③。张华娟、盛莉则对编纂人员的分工和《太平广记》的编纂流程作了一些推测。

《太平广记》的类目分类和编排是编纂中一个重要问题,刘叶秋认为《太平广记》类目分类“不免分合未当,零乱、重复”,如“神仙”类外,又有“女仙”,还另分“神”一类,“即不够妥当”^④。韩国郑宣景则认为:“‘女仙’类主要汇聚女性神仙,而‘神’类主要以具有地方特色的祖堂神、祠堂神为主,其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异”,因此其类目分类还是较为恰当的^⑤。张国风《〈太平广记〉版本考述》、张华娟《〈太平广记〉研究》则指出,《太平广记》的类目是按内容主题来分类的,这种分类是在继承前代书籍,尤其是前代子部书籍和小说集子的分类基础上创新而来的。张华娟、盛莉等还总结了《太平广记》类目编排的特点,认为《太平广记》分类具有宗教色彩、暗含哲学思想、有人本文化知性气息、显示了史学传统与小说性等特点。此外,美国查尔斯·爱德华·哈蒙德(Charles Edward, Hammond)《〈太平广记〉的类目》也对《太平广记》的类目编排与小说文本关系作了研究^⑥。

王国良先生对《太平广记》每个类目内部的编排作了考察,认为“书中每一类,大致依照原文所记年代先后排列,篇末各注出处。原则上,每篇引用一书,或有因主角相同或情节类似,遂将相关资料同列,再注明自某某等书者”^⑦。

①赵维国:《论〈太平广记〉纂修的文化因素》,《河南大学学报》2001年第3期。

②张华娟:《〈太平广记〉研究》,第4页。

③张国风:《〈太平广记〉版本考述》,第4页。

④刘叶秋:《类书简说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49页。

⑤郑宣景:《神仙的时空——〈太平广记〉神仙故事研究》,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2007年,第29页注2。

⑥查尔斯·爱德华·哈蒙德(Charles Edward, Hammond):《〈太平广记〉的类目》(Th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“T'ai-p'ing Kuang-chi”),《中国文学》(Chinese Literature: Essays, Articles, Reviews)1980年第2期。因只见该文的部分内容,故只列书目于此。

⑦王国良:《谈〈太平广记〉之阅读与研究》,广岛中国学学会《中国学研究论集》第5号,2000年。

山田利明、郑宣景则分别从个案出发,都对《太平广记》五十五卷“神仙”类故事的内部编排进行了考察,认为神仙类故事是按时代先后来编排的,卷一至卷五是有关黄帝或周朝时期古仙的记录,卷六至卷十三为春秋战国、汉代神仙,卷十四、十五是汉、魏晋六朝时代的神仙,卷十六至卷十八为隋代的神仙,卷十九至卷五五为唐代神仙^①。

四、《太平广记》的文献价值研究

陆湘怀《论〈太平广记〉的文学文献价值》从辑佚、校勘、本事探源等方面分析了《太平广记》的文献价值,认为《太平广记》“具有极高的辑佚和校勘价值”,它不仅具有整理古小说方面的价值,还具有整理诗歌的价值;同时《太平广记》又为通俗小说和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提供了大量的题材本源,因此在本事探源方面也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^②。韩国诸海星也指出《太平广记》具有丰富的小说史料价值,它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本事^③。薛克翘《〈太平广记〉的贡献》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出发探讨了《太平广记》的文献价值,认为《太平广记》为中印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,如钱钟书、季羨林等先生在做中印比较文学研究时就大量采用《太平广记》的文献资料来进行论述^④。

《太平广记》的文学文献价值研究还体现在对《太平广记》选本的辑录上。早在明代,冯梦龙就辑有《太平广记钞》,当代王汝寿则辑有《太平广记选》(上下)、《太平广记选》(续),周振甫主编《白话太平广记》(上下)^⑤。这些选本依据编者的文学理念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文本编辑成册。也有围绕某种选题类型来辑录《太平广记》的,如《〈太平广记〉中龙的神话》、《〈太平广记〉传奇》,前者是从题材主题来辑选的,后者则是从小说体裁来辑选的^⑥。

李季平、王洪军指出《太平广记》的文献价值“并不局限于文学,已经扩大到很多社会学科领域”,其“大量不见史籍记载的重要资料,是研治魏晋隋唐社会历史的一个资料‘宝库’”。作者从《太平广记》中“辑录了50种左右的

①山田利明:《〈太平广记〉神仙类卷第配列之一考察》,《东方宗教》第43期,1972年;郑宣景:《神仙的时空——〈太平广记〉神仙故事研究》,第29页。

②陆湘怀:《论〈太平广记〉的文学文献价值》,《抚州师专学报》1996年第4期。

③诸海星:《浅谈〈太平广记〉的小说史料价值》,《东亚文化》第33期,2000年。

④薛克翘:《〈太平广记〉的贡献》,《南亚研究》1999年第2期。

⑤王汝寿等选注:《太平广记选》(上、下),齐鲁书社,1980年第1版;王汝寿主编:《太平广记选》(续),齐鲁书社,1982年;周振甫主编:《白话太平广记》(上、下)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3年。

⑥北京市旅游局编:《〈太平广记〉中龙的神话》,旅游出版社,1987年;禾青编著:《〈太平广记〉传奇》,林郁文化事业有限公司,1995年。

社会史料,经过进一步筛选、整理、集其精萃”形成《〈太平广记〉社会史料集萃》^①一书。

魏明安肯定了《太平广记》的音乐史料价值:“《广记》卷二〇四、二〇五所录,基本上是唐代的音乐史料。从人物来讲,它涉及帝王、宰辅、封疆大吏到落魄书生、歌女、乐工等广泛的阶层。这些原始资料,或为史传所本,或为史传之缺笔,编写音乐文化史尤应珍视这些第一手资料。”^②日本松尾良树则从中国漆工艺术上肯定了《太平广记》的漆工艺史料价值^③。

五、《太平广记》的传播研究

《太平广记》的文本传播分为两类,一是在国内历时性的传播,一是在国外(主要是韩国)跨地域的传播。

宋王应麟《玉海》卷五四注云“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,收墨板藏太清楼”。据此一般认为《太平广记》于宋代期间未有传播,如鲁迅就承此而言:“后以言者谓非后学所急,乃收版贮太清楼,故宋人反多未见。”^④钱钟书也说:“遽测宋末《广记》广传,犹未许在。”^⑤但近来有论者对此却持异论。张国风认为:“尽管我们找不到北宋刊刻过《太平广记》的确定记载,但是,从现有的材料来看,《太平广记》在北宋有所流传却是不争的事实”,而在南宋,“有关《太平广记》的记载也愈来愈多”,其“影响并不局限于文人”^⑥。凌郁之通过大量文献梳理比勘,认为《太平广记》从其编纂开始就有“被部分或全部转抄出去的可能”,“最先流传人间的《太平广记》,恐是当年修书人私自誊录之本(未必全本)”,“镂本收贮太清楼后,仍有不公开刻印的可能”;“高宗时期新印《太平广记》,当是依据太宗初刻本,也即太清楼藏镂版”;“书坊当有伺机翻印之本,于是广泛流行于民间”^⑦。姜光斗、成明明等人也通过一些文献资料的搜集,补充证明了《太平广记》在两宋时期确已流传的实际^⑧。

①该书于1999年由齐鲁书社出版。

②魏明安:《从艺术史料上窥探〈太平广记〉》,《兰州大学学报》1987年第2期。

③松尾良树:《〈太平广记〉中的中国漆工艺史料》,《奈良女子大学文学研究年报》第39期,1995年。

④鲁迅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2年,第67页。

⑤钱钟书:《管锥编》第二册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641页。

⑥张国风:《〈太平广记〉版本考述》,第6-10页。

⑦凌郁之:《〈太平广记〉的编刻、传播及小说观念》,《苏州科技学院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05年第3期。

⑧姜光斗:《〈太平广记〉在北宋流传的二则记载》,《〈太平广记〉在南宋流传的三则记载》,《文献》2003年第3期;成明明:《两宋〈太平广记〉流传与接受补证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9年第2期。

宋莉华对明清时期的《太平广记》传播情况作了一定考查,认为其传播“产生的直接效应就是时人多据以辑刻小说集、丛书”。冯梦龙编纂的《太平广记钞》“是为纠正《太平广记》卷帙浩繁、内容烦琐、人莫之阅的弊端而作的删节改编本”。此外,有清初陶作楫《太平广记节要》、清人陆寿名撰《续太平广记》等,“都属于《太平广记》流传的馀波”^①。

牛景丽通过大量的原始文献爬梳,对《太平广记》自宋至清的传播作了完整的梳理,认为:“《太平广记》成书后虽然没能即时刊行,但至迟到宋神宗、哲宗时期,已渐渐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流传开来,经过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的刊刻,《太平广记》在社会上的传播越来越广”;“金、元时期,《太平广记》继续保持着比较广泛的传播”;但“《太平广记》在明代前二百年的时间里越来越不易见到”,这与《太平广记》刊刻稀少和部头太大不易抄录有一定关系;明谈恺本、许自昌本和清黄晟本出现后,“极大地促进了《太平广记》的传播”,在明清时期,“《太平广记》已成为了文人必备的参考书和工具书,甚至成为小说书写的对象”^②。

《太平广记》的域外传播研究主要是在韩国传播的研究,韩国闵宽东认为《太平广记》传入韩国的时间大概在1100-1200年间。朝鲜世祖六年(1492)成和仲(即成任)辑刊《太平广记》的节缩本《详节太平广记》五十卷,共分一百四十三个项目,收录了八百四十三篇作品。其后成和仲参考《太平广记》样式,在《太平广记》出版以后的中国古籍和韩国古籍中钩沉、辑录了大量作品,辑成《太平通载》八十卷。大概于朝鲜明宗二十一年至宣祖年间(1566-1608)又有《太平广记谚解》五卷刊行^③。韩国诸海星在闵氏论文基础上又作了一些文献补充,充实了《太平广记》在韩国传播情况的描述,但未有新的观点^④。针对闵氏观点,赵维国则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,推断《太平广记》传入高丽的“最早时间当为熙宁五年(1072)”,“最迟当在元丰三年(1080)”^⑤。此外,韩国徐张源和安炳国也分别对《太平广记》东传韩国的情况作过研究,但都没指出传入韩国的确切时间^⑥。

韩国金长焕、李来宗、朴在渊等对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太平广记详节》的韩文

①宋莉华:《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,第242-246页。

②牛景丽:《〈太平广记〉的传播与影响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,2008年,第89-90页。

③闵宽东:《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》,学林出版社,1998年,第243-245页;《在韩国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入与研究》,《明清小说研究》1997年第4期。

④诸海星:《〈太平广记〉在韩国的流传及其影响》,《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3年。

⑤赵维国:《〈太平广记〉传入韩国时间考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2年第2期。

⑥徐张源:《〈太平广记〉东传之始末及其影响》,《中国语文学》第7期,1984年;安炳国:《〈太平广记〉的传入及影响》,《温知论丛》第6期,2000年。

注译作过重要贡献,为《太平广记》在当代韩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^①。

六、反思

《太平广记》文献研究尽管成就不少,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。

就版本研究来看,如谈刻三本刊印的先后顺序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,清代几种钞刻本所采用的校对本是否为宋本仍没有完全弄清,现存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仍是不甚清晰。版本研究不够深入,一方面与《太平广记》现存版本稀少的客观条件有关,另一方面与研究者所投入的时间、精力和研究的方法与态度等主观努力也密切相关。就引书研究来看,研究者之所以对《太平广记》引书的总数各执一数,主要有三方面原因:一是《太平广记》引书本身存在缺陷性,有不少可能是二手甚至是三手的材料;二是《太平广记》的刊刻传播过程中鲁鱼亥豕,对一些书名作错误刊抄;三是研究者没有对引书作仔细甄别,没有顾及到《太平广记》不同版本的引书情况,统计方法过于简单。就类目编排研究来看,研究者忽略了宋初的时代文化精神,如宋初“三教合一”的宗教文化态势,对编纂《太平广记》的直接影响和作用,因而也不能有效地阐释类目编排的真正意蕴。就文献价值和文本传播研究来看,研究的时间和挖掘的文献资料还都十分有限,因此其研究的深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掘。

鉴于《太平广记》的版本和引书研究都遭遇到资料匮乏的瓶颈,《太平广记》的文献研究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重点展开。首先,通过文本文字与引书文本文字的校勘研究,以内证的研究方法来间接探讨版本和引书问题。其次,进一步拓展《太平广记》文献价值研究范围。研究方面不仅包括文学、史学,还应涉及宗教学、文化学等领域。再次,进一步拓展《太平广记》文本传播和接受史研究,使其体现出更多的文化价值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

^①金长焕、李来宗、朴在渊译注编:《太平广记详节》(1-4),学古房,2005年;《太平广记》(1-21),学古房,2000年至2005年。